

鲁迅年谱

第四卷

鲁 迅 年 谱

第 四 卷

鲁 迅 博 物 馆 编
鲁 迅 研 究 室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主 编 李 何 林

主要撰稿者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积贤 王德厚 江小蕙 李允经

陈鸣树 陈漱渝 林志浩 姚锡佩

潘德延

鲁 迅 年 谱 (四)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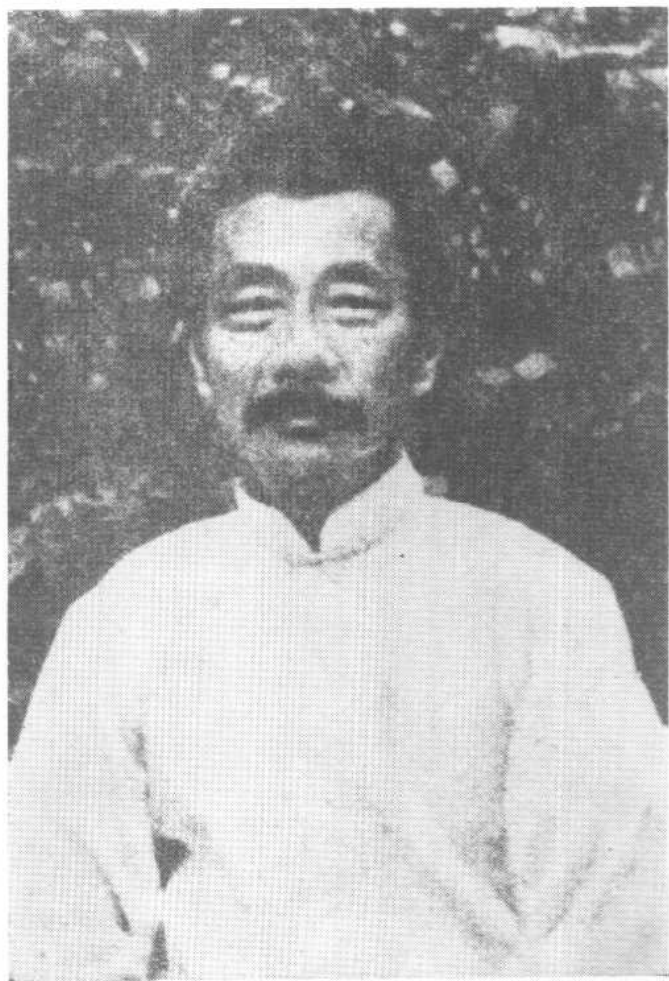
字数 32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3}{4}$ 插页 4

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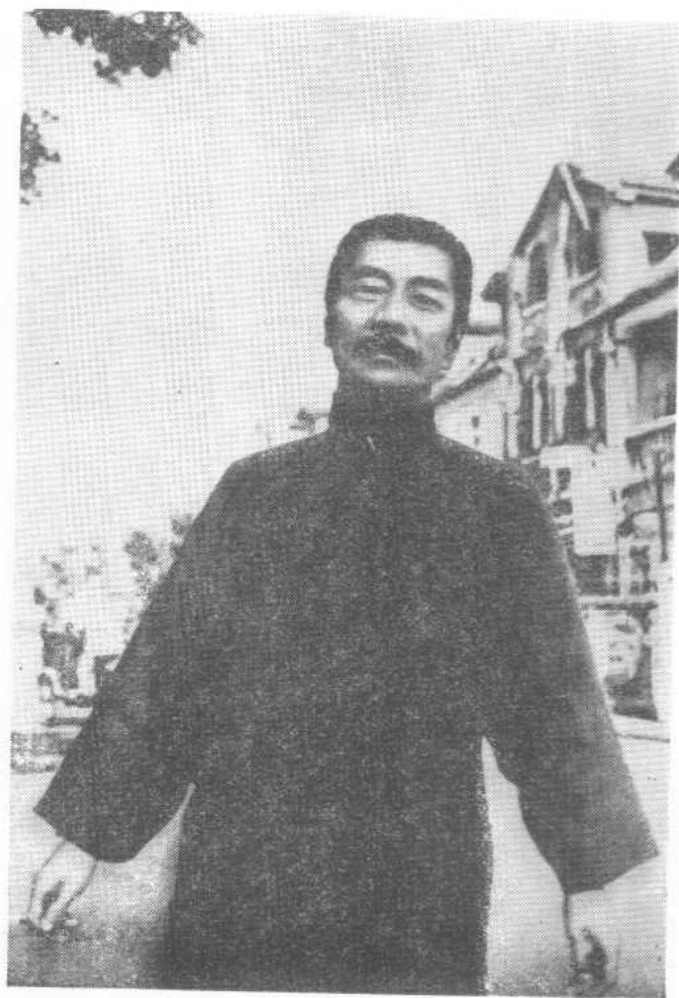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6,100

书号 10019·3692

定价 2.40 元



1934年8月29日摄于上海内山完造寓所



1935年摄于上海内山书店门前



1936年10月2日摄于上海大陆新邨寓所



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DD21/14

~~DD21/34~~

编写说明

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婴同志上书毛主席，提出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工作等方面“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编写一部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翔实可靠的《鲁迅年谱》，毛主席作了“立即实行”的批示。我室成立后，即遵循上述批示精神，认真作了研究，并着手编写这部《鲁迅年谱》。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掌握能够得到的材料，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力求使这部《年谱》能体现鲁迅的光辉形象、不平凡的一生和思想发展过程。

二 为了说明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或何种历史环境中从事革命工作和创作的，以及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与客观环境的联系，在鲁迅本事之前均列有跟鲁迅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时代背景（中外大事记）：一八八一至一九一八年，均列于每年之前；一九一九至一九三六年，均列于每月之前；与鲁迅生平 and 著作有关的具体背景，则编入本事。

三 鲁迅生平事迹和所有著作及译文（包括小说、诗歌、戏

剧、论文、杂文、散文、散文诗、序跋、附记、按语、启事、广告、辑录校勘的古籍，等等）一律入谱；书信、日记有选择地入谱。入谱的著作和事件，凡知其年月日者，均按时间顺序入谱；仅知年月，不知日期者，入于本月末；无月可据者，则考订到季；仅知年，而又无法考订到季者，则入于本年末。凡写作时间不可考者，按发表时间入谱。写作时间见于作品和日记，如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者，根据考订后的时间入谱。

四 对鲁迅著作，一般的每篇均写有题解（包括文章写作的背景或针对性、思想内容提要、编者简评以及其它有关材料），说明鲁迅的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供读者参考。

五 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除时代背景外，对本谱引文和所据资料，均注明出处；见于日记的，一般不加注释。与鲁迅有关的人物、书刊、社团仅作简明的注释；有关的考证和分歧说法，则在注释中加按语予以说明。为了补充说明谱文的内容，还插入有关的图片，以供参考。

六 在书末附《鲁迅著译年表》和与鲁迅有关的人物、书刊、社团、教育活动的简表及笔名录等。

七 本谱引用的鲁迅著译，系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开始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和其它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书信。

八 本书编写：

1. 一八八一至一九〇二年三月以及一九〇九年八月至一九一二年四月的谱文由姚锡佩执笔；一九〇二年四月至一九〇九年七月的谱文由江小蕙执笔。

2.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的谱文初稿，由北京师范大学鲁迅书信注释组李允经、张建业、马畏安、黄一欧、吴宗蕙、王志民、史有为等撰写，由李允经、张建业修改；武汉大学中文系皮远长、南开大学中文系张铁荣参与了部分修改工作。后由李允经、陈漱渝改定。

3.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谱文草稿由高启明执笔，陈漱渝、江小蕙修改；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的谱文由王积贤执笔，姚锡佩统稿。

4.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的谱文由林志浩执笔。

5.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谱文由潘德延执笔；一九三六年的谱文由陈鸣树、王德厚执笔。

6. 在以上分工负责、执笔、修改以后，全书又经集体讨论、修改，由潘德延统一体例规格。

九 周建人、唐弢、戈宝权、孙用、周海婴、常惠、林辰等对本谱的编写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王瑶审阅了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谱文初稿；杨霁云审阅了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谱文初稿，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十 吕福堂、荣太之、张杰、赵淑英、叶淑穗、左瑾、皮远长、颜雄、李文儒、张铁荣、于万和等参加了本书的讨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十一 本书编写之前，在编写的目的、体例、内容要求等方面征求意见时，一些对鲁迅有研究的同志和有关单位提出了宝贵意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提供了有关资料；特别是上海《鲁迅年谱》编写组还将已经编出的《鲁迅年谱》初稿提供我们参考，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十二 编写《鲁迅年谱》涉及的内容广泛，我们限于知识思想水平，难免有许多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作进一步修订。

鲁迅博物馆《鲁迅年谱》编写组
鲁迅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二月

一九三四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五十四岁

一月十三日 国民党“中央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十九路军被改编为东路“剿共”第六路军。

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央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提出了重要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会议通过修正的宪法大纲和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等决议。二月三日，苏维埃政府举行第二届第一次执委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一月 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王明提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

本月 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强调“国力集中”，更加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到月底，国民党军在江西共筑碉堡两千九百个，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同月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

同月 郑振铎、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于北平创刊，出至二卷四期停刊。

同月 萧三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一月四日

与瞿秋白话别。瞿秋白将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当晚到鲁迅寓所叙别。据许广平回忆：“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同志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①瞿秋白将《乱弹》集文稿交给鲁迅保存。

^①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

一月六日

应《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之邀至汉口路的“古益轩”会餐。同席有郁达夫、唐弢^①等十二人。据唐弢回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变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而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那些‘看文章专用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我“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这次“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调转话头，亲切地问：‘你真个姓唐吗？’‘我真个姓唐，’我说。‘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

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侯’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②

① 唐弢，一九一三年生，笔名晦庵等，浙江镇海人，作家。一九三二年在上海邮局工作时经常向《申报·自由谈》投稿。自本日与鲁迅相识后，常有联系，并得到鲁迅的帮助。

② 唐弢：《琐记》，见一九七八年一月《鲁迅回忆录》第一集。

一月八日

1. 作《未来的光荣》。载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张承祿。收入《花边文学》。文章揭露法国德哥派拉①这类“恭维食与色”的文学家来华的目的，说他们无非是要“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中国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因此，鲁迅语重心长地提出：“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这样的事为有趣。”鲁迅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王志之信中曾指出：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来看支那土人，做书卖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借丑化和侮辱中国人民来渔利的行径。

2. 作《女人未必多说谎》。载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赵令仪。收入《花边文学》。当时韩侍桁②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谈说谎》一文，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鲁迅在本文中用古今中外的史实，批驳了这种污蔑妇女的言论。指出，“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历史上“女人的替自己

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文中引古喻今，讽刺国民党当局提倡所谓“妇女国货年”，不过是企图向妇女转嫁丧权辱国责任的新花招。

3. 复增田涉信。对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疑难问题作了解答，并将对该书的改正之处另写一并寄去。

① 德哥派拉(1885—1973)，法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曾来我国上海、北平等地“游览”，搜集奇特、落后、色情的小说的材料。

② 韩侍桁，一九〇八年生，原名韩云浦，笔名侍桁、索夫、东声，天津人。早先是《语丝》的撰稿者，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转向“第三种人”。曾任中山大学、齐鲁大学教授，以及中山文化教育馆特约编译、中央通讯社特约战地记者和该社总编室编审，重庆文风书局总编辑、上海编译所所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文学评论集》、杂文集《小文章》、《参差集》、《浅见集》。译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红学》、《卡斯特桥市长》、《妇女乐园》、《英雄国》等。

一月九日

寄苏联木刻家亚力舍夫等人信并木板顾恺之画《列女传》、《梅谱》、《晚笑堂画传》、石印《历代名人画谱》、《耕织图题咏》、《圆明园图咏》各一部，共十七本。信是由瞿秋白于六日用俄文代写的^①，原稿不存，后据苏联出版物译出。信中谈了苏联版画在上海展出时受到中国青年木刻家和革命者热烈欢迎的情形，介绍了中国版画发展的概况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罪行。同时说明寄去的“这些东西，在中国已很少见，而那三本直接用木板印刷的书籍，则几乎具有博物馆珍品的价值”。信末还说，“最近我们收到五十多幅初学版画的青年的作

品”，现应法国意达·特勒娅（通译绮达·谭丽德）的要求，“即将寄往巴黎展览，她答应在巴黎展览完之后立即转寄苏联”，“我们恳请你们对这些幼稚的作品提出批评”。此信表达了鲁迅对苏联木刻家的深厚情谊。

① 见鲁迅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致曹靖华信。

一月十一日

1. 致山本初枝信。辞谢了她对鲁迅旅日的邀请。信中说：“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罢。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钉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时还是等等再说为好。”信中还谈到国内白色恐怖的情形：“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在去年七月十一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也曾谈到旅日之事，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①，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

2. 致郑振铎信。信中说准备将《北平笈谱》分寄各国图书馆（但法西斯之意大利、德意志和“自以为绅士”之英国除外）；并建议郑振铎编印《明代小说传奇插画集》，进而影印明板小说，如《西游》、《平妖》之类，以便“使它能够久传”。鲁迅为维护祖国文化遗产而编印《北平笈谱》的举动，曾遭到一些人的嘲讽和攻击^②，

因此，他在信中驳斥说：“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最末，是‘大出丧’而已。”

① 一九三三年上海《社会新闻》四卷一期发表一篇署名道的文章，造谣说：“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据确信，鲁迅赴青岛……”

②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邵洵美所编《十日谈》新年特辑中载有杨天南的《二十二年的出版界》一文，其中说：“特别可以提起的是北平笈谱，此种文雅的事，由鲁迅西谛二人之为之，提倡中国古法木刻，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至于全书六册预购价十二元，真吓得煞人也。无论如何，中国尚有如此优游不迫之好奇精神，是十分可贺的，但愿所余四十余部，没有一个困暇之人敢去接受。”

一月十七日

1. 作《批评家的批评家》。载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倪朔尔。收入《花边文学》。《现代》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攻击革命的文学批评“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苏汶在《现代》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的《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也诬蔑这些文艺批评是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鲁迅在本文中驳斥了这些观点，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坚持了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原则。